

汉语词汇 负面义研究

黄红娟◎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汉语词汇 负面义研究

黄红娟◎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词汇负面义研究 / 黄红娟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5097 - 5929 - 5

I. ①汉… II. ①黄… III. ①汉语 - 词汇学 - 研究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8375 号

汉语词汇负面义研究

著 者 / 黄红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责任编辑 / 高 雁 梁 雁

项目统筹 / 高 雁

责任校对 / 李 敏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 17.75

版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字 数 / 298 千字

印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929 - 5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摘 要

本书结合共时、历时考察,从纵横两个方向比较系统全面地描写并分析了汉语词汇负面义的类型、生成、显现、演变、感知等相关内容,并将语法研究与词汇研究结合,重点关注词汇负面义在语义与语用两个层面的表现,主要内容与结论如下。

第一,比较系统地归纳并描写了词汇负面义的类型、生成方式与条件、表现方式及相关特征。认为词汇负面义的生成需要确立某种立场、视角及评判原则,进而建构有特定属性限定的词义框架并对其内容进行匹配,然后在一定的社会心理认知条件下激发出相关负面义。

第二,结合词义释义模式与配价理论分析讨论词汇负面义关涉的分布、负面义指向的分布及其重心的转移与相关共现成分正负面属性限定之间的关系,考察两类动词中相关权势关系的强弱、实现程度及方向性对负面义指向和重心转移的影响。分析描写相关负面义辖域的实现方式、组成内容特征与方向性,考察它们负面义的实现方式与分布位置的关系。

第三,比照特定历史文化思想观念的发展,细致地分析讨论相关汉语词汇负面义的演变规律与阶段性特征。区分象征性文化潜义和比拟性文化潜义,讨论大小文化语境的正负面属性差异与古今演变的问题。

第四,考察词汇负面义的演变在所属词条内部和相关语义场中的表现。统计分析语用组合变化对词汇负面义演变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同化式感染和拆解式感染的区别。进行关于词汇负面义的主观感知调查,分析语用主体感知差异的表现规律及原因。讨论现代传播方式对词汇负面义的整体演变和批量生产所起的作用,尝试运用异端话语理论分析“文化大革命”时期与新时期词汇负面义大转向的同与异。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001
第一节 研究对象界定	/ 001
第二节 相关内容回顾	/ 004
第三节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与主体框架	/ 014
第二章 汉语词汇负面义的类型与生成条件及构成方式	/ 019
第一节 汉语词汇负面义的性质类型	/ 019
第二节 汉语含负面义的词汇生成方式	/ 029
第三节 词汇负面义的生成模式与确立条件	/ 037
第四节 汉语词汇负面义的结构方式与表现形式	/ 048
第五节 小结	/ 057
第三章 汉语词汇负面义的关涉、指向与辖域	/ 059
第一节 汉语词汇负面义的关涉要素与指向对象（上）	/ 059
第二节 汉语词汇负面义的关涉要素与指向对象（下）	/ 070
第三节 动词的配价与负面义指向及权势关系与负面义重心的转移	/ 084
第四节 汉语词汇负面义的辖域及其实现方式	/ 094
第五节 小结	/ 109
第四章 历史文化因素与汉语词汇负面义的生成及演变	/ 110
第一节 从鬼神观的演变看含“鬼”词串负面义的生成与演变	/ 112

第二节 动物词中的负面文化潜义及其演化

——以含“狗”词串负面义的演化为例 / 125

第三节 佛教语源的词汇负面义 / 136

第四节 词汇负面义在大小文化语境中的差异 / 142

第五节 小结 / 145

第五章 汉语词汇负面义的演变与社会因素 / 147

第一节 汉语词汇负面义的演变及其在相关词条、语义场中的表现 / 147

第二节 语用组合的变化对词汇负面义的影响 / 159

第三节 词汇负面义的主观感知判断调查及相关分析 / 177

第四节 语用习惯、现代传播方式对词汇负面义演变的影响 / 196

第五节 小结 / 205

第六章 汉语词汇负面义研究的应用及结语 / 206

第一节 汉语词汇负面义研究的应用 / 206

第二节 研究局限与可拓展空间 / 214

结 语 / 219

附 录 / 221

附录1 组合倾向式负面义 / 221

附录2 “滋生”人民网检索句例前200条 / 222

附录3 “温床”人民网检索句例前200条 / 233

附录4 “信誓旦旦”人民网检索句例前200条 / 245

附录5 词汇负面义主观判断调查表 / 267

参考文献 / 269

| 第一章 |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界定

一 词汇负面义的来源与意义

负面意义来源于人们在心理与意识中形成的对自身的存在及其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的认识与理解。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负面意义在语言的不同界面中以特定的方式反映和显现，其中尤以在词汇层面表现得更为集中、显著。无论是想要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还是想要钻研语言自身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进而探寻语言与人类社会生活发展之间的关联程度，从词汇负面义入手都会是一个理想的切入点。对拥有悠久历史的汉语而言，着手进行这项研究是十分有意义且非常必要的。

首先要指出的是，之所以采用“词汇负面义”这一表述，而不采用过去惯用的相关性较大的“贬义词”，也不赞同以“词语的色彩”这一名称来讨论这方面的内容是有原因的：本书要讨论的不是单个的贬义词或贬义词的贬义，而是整个词汇系统中带有负面性意义的词汇及其所包含的负面义。我们认为，“词汇负面义”比“贬义词的贬义”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前者同时具有个体性与整体意识，既可指含有负面意义的具体词义，又可指含有某一类范畴的负面意义在词义中的反映，同时还可以包括整个词汇义，又或是仅指含有负面意义的语素义或者某词的词义中带有负面性的那部分内容。

另外，“负面意义”涉及的内容比较多，在指称、陈述、评价中都有运用，表描述、表性状或是表动作行为皆可，这样就可以不再受过去关于贬义判定标准的限制（谭达人，1991），可在其框架下从容讨论“敌人”

“仇人”“失望”之类的词语，涵盖面比“贬义”更广。

二 词汇负面义的类属界定

（一）贬义与贬义词

关于何为贬义、贬义词及其判定，关英伟（1995）认为贬义表现为对主体的厌恶和憎恨等否定的感情色彩；符淮青（1985：27）认为词义为否定的，感情色彩为贬，他提到的否定类有愤恨、怨恨、惨痛、悲哀、伤心、不高兴等；刘叔新（1990）认为，带有恶感的评价色彩或感情色彩的词是贬义词；陆善采（1993）将“凡是表示否定或贬斥，带有令人憎恶的感情色彩的词”称为贬义词；温端政（2006：71）将感情分为肯定与否定两类，其中“有些词表明人对事物厌恶、贬斥的感情，被称为贬义词”。

从上面的概述中我们可发现，在已有的词汇研究中，有关贬义的讨论总是放入词的感情色彩这一词义类别中的小类加以研究，且多将贬义与褒义结合起来一起讨论，并认为词的褒贬义是词的表达色彩的一种表现。大多数学者（葛本仪，2003；许威汉，1992；刘叔新，1990；詹人凤，1997等）将贬义词与贬义视作词的色彩意义（或称附属意义、陪义等），并将其与词的理性意义（或称概念意义、基义等）相对立，但他们也承认有的理性意义也有贬义成分，而且人们对其所属为评价色彩或是感情色彩、态度色彩中的哪一类还存在分歧。至于其具体所属小类，学者的观点也有分歧。贾彦德（1986：16）、周光庆（1989：105）、许威汉（1992：130）、詹人凤（1997：75）、符淮青（2004：55）将其归为感情色彩，武占坤、王勤（1983）称其为情调色彩，武占坤（1983）称其为表情色彩。刘叔新（1990：188）则将其归入评价色彩与态度色彩、感情色彩，不同意将感情色彩分为褒和贬两种，指出“像悲哀、惧怕、气恼、怅惘而痛苦等感情都不可能归入褒的或贬的类别之中”。张志毅、张庆云（2001：46）提出将情感、态度、评价合称为“情态陪义”。解海江、张志毅（2003）亦认为感情色彩难以用褒贬来概括，应区分词的褒贬义中感情色彩和评价态度色彩的不同表现。王德春（1983：120）则将褒贬义列入修辞意义中的表情色彩，他认为表情色彩兼具表评价和态度的作用。

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学者的观点已有了改变，有人（邢向东，1985；符淮青，1985；周荐，1985、1993；许威汉，2000；张志毅、张庆

云, 2001; 解海江、张志毅, 2003 等) 已指出该类提法存在的不足, 邢向东认为褒贬不仅仅是附加色彩, 符淮青和周荐俱指出, 褒贬义不仅局限于附属意义中, 有的词的理性意义本身就含有褒贬成分。周荐 (2004: 151) 还谈到, 无论是理性意义还是表达色彩, 都可能会有褒贬之分, 若认为感情色彩就是褒义词、贬义词, 就容易把理性意义和表达色彩这两种不同质的现象搞混。

要言之, 对贬义词的讨论主要集中于附属义中的色彩义, 关于其性质的分类又主要涉及情感、态度、评价三类, 但具体归属及区分标准目前仍无定论。我们不反对理性义与附属义的分类, 也不反对关于词义中所蕴涵的情感、态度与评价的区分, 但在实际生活中, 相关内容的表现往往合一, 且在词义的分析研究中具体区分也属不易。

(二) 消极意义

和词汇负面义相关的研究课题还有词语的消极意义, 其相关界定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因语用中的相关共现成分带来的消极色彩感染, 二是作为评价意义的词义本身。前者主要是语义韵律理论讨论的内容 (Louw, 1993; Sinclair, 2004; Partington, 2004; 于屏方, 2007: 140 等), 后者如邹韶华 (2001: 113 ~ 121)、刘慧 (2009: 19; 27; 34) 的研究界定。邹韶华的消极词汇研究包括以下四类: 直接体现贬义的、搭配体现贬义的、隐含取舍评价态度的、在对立计量上处于“小”极的, 其分类已涉及主、客观表现及语用三个标准的内容, 较有新意; 刘慧主要是从评价性的角度区分积极评价、消极评价与中性评价, 并区分显性消极评价与隐性消极评价。前者主要考虑其共现组合产生的限制与影响, 后者则尝试构筑一个特定语义的连续系统。

(三) 本书的界定

本书主要考察词汇层面相关负面性意义的蕴涵、显现与运用方式, 希望由此探讨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判断、人类个体在社会中的认同、归属与区别等活动在语言层面的反映与变化。为了更好地突出重心, 本书采用更能反映我们研究理念的“词汇负面义”。

虽说负面义的存在本身是有客观基础的, 但其判断与感知受到主观立场与认识的极大限制, 也会在无意识中受到已有的语用惯性的影响。有鉴



于此,我们将从客观存在、主观判断和语用习惯的无意识表现等角度切入,展开对汉语词汇负面义的生成基础的讨论。它们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一些有客观依据的概念性内容,即汉语社会环境中常规状态下的人类个体本能地不希望发生或出现的一些情况或状态、不愿遇到的一些事与物,又或是尽量避免直接提到的禁忌以及对这些情况、状态与事物的指称、描述与评价等,具体包括诸如死亡、灾难与伤害,人类本能具有的一些消极性情绪状态,或是对本能所抵触厌恶的人、事、物的基本表述,同时还包括被常规汉语社会的法律与道德规范所禁止或要求用其他方式表达的言论行为,以及反映上述内容的陈述性命题等。

第二,相关心理态度与语用倾向决定的内容,包括在使用过程中表达了言说者对被指称对象的厌恶、鄙视等负面性态度的指称、描述等;又如使用时习惯性地与负面性内容共现的语义内容;又或带有较强的负面认知心理倾向,负面性判断极易被激活的词义内容等。

相关的甄别与筛选标准及内容范围的增删将在书中展开相关讨论时再做说明。

第二节 相关内容回顾

有关汉语词汇负面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的褒贬,即词的贬义问题上。因为材料过多,在此只选取较有代表性的进行论述。概括说来,学者的研究工作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 相关研究内容

(一) 贬义的构成、显现与搭配

贬义的构成主要讨论其构成方式、构词语素与词的关系、相关格式等问题。

任远(1982)认为褒贬词的产生有两种途径,一为造词法,其产生的褒贬义为词本身所固有;一为用词法,其具有的褒贬义是词义发展的结果。其他如徐志民(1980)指出词的感情色彩是它们所固有的,从而区别于词在特殊的语境中因修辞手法而临时带有的色彩。

周荐(1985)提出感情色彩构成方式分类的初步想法,共分为五类:

一是直接依附于理性意义，对理性意义进行不加扭曲的感情的说明。我们认为所谓的“不加扭曲”，即后来他（周荐，1993）在讨论理性意义和表达色彩关系时提出来的二者相一致的情况。二是本不用于人的词语转指人或与人相关的事物。三是比喻义与感情色彩有某种对应关系。四是因搭配而感染的感情色彩。五是语义联想，如某些心理与生活经验带来的感情倾向。此种区分与任远的造词与用词有一定的交叉，但讨论更具体，不过总的说来仍是以理性意义与附加意义的区分为前提的。

在词的褒贬义与构成词素义的关系方面，刘缙（1993）的分析较细。他的统计指出在词语的褒贬义中构词语素本身带有感情色彩的占80%，不带的占15%，此外因搭配产生的褒贬义占5%，并指出构词语素义的褒贬和词义的褒贬问题的讨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有积极的意义。

杨振兰（2001）认为可以在感情义位的基础上进行感情义素的分析，建构出感情义素中的褒义场和贬义场小类，从而打破一般情况下理性义素为第一位的限制，方便对感情义位进行对比分析。杨振兰（2005）还指出，在色彩意义中，造词材料对感情色彩的表现尤为突出。感情色彩的形成机制更偏重于意义型，情感性的词素比中性词素对词的感情色彩的影响要大得多。但刘缙、杨振兰两位没有对构词语素与内部结构进行深入讨论。若撇开结构类型，单就构词语素本身来讨论褒贬义似乎不够全面，针对这一问题，张志毅、张庆云（2001：257）有相关的讨论，他们在义位的组合原则中归纳出“贬化”一类，专门分析中性义位组合后变坏、贬降的倾向，这就与构词格式的讨论中对相关组成要素的语义限定条件形成了参照性的互补。

在相关构成格式方面，任远（1982）列举出了常见的大多数格式，他将其分为词尾式如“不溜丢”“叽叽”；嵌字式如嵌入“三、四”或“七、八”的；叠字嵌字式；否定式四种。这些格式在任学良（1981：102）的研究中被称为“加嵌式”，后来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其中以否定式“不A不B”的讨论最多。王德春（1983：17）指出“不三不四”中的“三”与“四”有不规矩之意。周荐（2004：289）则认为“不三不四”中的“三”“四”与“说三道四”中的“三”“四”不同，进一步探讨了可能存在的两种语义结构的套用。杨联陞（2006：198～201）还将此结构从来源上与“A不A，B不B”“无A无B”结合起来讨论，指出汉语中有一种不执定的双无式，认为它们都与中国思想注重中与和、戒偏执的道德取向有

关。不过“不A不B”格式的语义生成模式显然要比单纯的“中”“和”思想要复杂得多，周小兵（2006）、王树瑛（1999）、罗耀华（2002）、黄谷（2002）等人都尝试将其语义组合的模式与A、B的词义限制条件进行细化再分类讨论，分类的标准因学者而异，相关的分析已扩展到变式，但已有人指出（邓英树、黄谷，2002）：“语法结构只有一定影响，不是决定因素。”

和研究“不A不B”式的热闹氛围不同，专门讨论汉语褒贬词义的显现的论著不多，但有成果是比较突出的。如周荐（1993）以理性意义和表达色彩上的褒贬意义的有无组合将讨论分成三类，分别为：只是理性意义有褒贬倾向的，只表达色彩带来褒贬倾向的与理性意义和表达色彩都有褒贬意味的。此文还将词语表达色彩按显映方式的不同分为自显式、对显式与从显式三种。周荐的研究从理性意义和表达色彩的关系，以及词语本身和他词的比照、词与词的固定搭配组合等方面对表达色彩的显映方式进行研究，具有开创性。

值得关注的还有邹韶华（2004：82）“准褒贬词”的提法，即那些“在词典里是中性词，但在特定的语境中虽然没有受到性状修饰也会显示出褒义或贬义来”的词，“是词汇系统中的一部分，褒贬义必须在特定的格式中才能出现”。这里共现格式也成了贬义词显现的方式之一。这一研究思路体现了某些特定语义范畴词语因人类认知感受一致性的影响会在具体语境中产生偏移，但还不是明确的共现搭配的限制。

词的褒贬色彩与搭配的问题最早由袁毓林（1987）提出，他主要探讨的是动词与宾语的褒贬搭配关系。此后，对此问题讨论较细的是郭先珍、王玲玲（1991），她们把褒贬义词的搭配分为顺向与逆向两种，认为两种搭配方向中体现出褒贬义词组合时可能存在的一致性与排斥性，并将这种顺逆方向和一致与排斥在性质上的差别置于组合的不同结构中分析，讨论组合中重心义位的褒贬色彩对整个组合褒贬色彩的影响。

此外，葛本仪（2003：570）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总结，他指出：“感情色彩组合的一致性、和谐性不是单纯地表现为褒义加褒义，贬义加贬义等，即并非褒义不能与贬义相结合，而是表现出为褒义的人或事件要求与之搭配的词的色彩义也是呈现褒义性。”反之，贬义词的搭配亦然。这一说法有启发意义，遗憾的是他没有展开深入分析。

有学者进一步将词的褒贬色彩与搭配问题扩大到句法层面，袁毓林

(1999: 78~79)指出,在一般情况下,贬义的自主动词只能进入否定式祈使句,因为说话人对自己阻止听话人做的事不会在否定式祈使句中直接做出肯定性判断。袁毓林(1999: 99)还发现,贬义的自主形容词也有类似限制,这说明祈使句式对相关词类中的褒贬义词有一定的语用条件限制。王惠(2004)讨论名词词义的组合时谈到,“田地²”只能出现在“到……田地”这一格式,而有贬责意味的“意见²”仅限于两个位置上,一是在“有/没有/提……”中做宾语,二是在“某人对某人/某事的……大/小/多/少”里做主语。

贬义还有程度的差别,对此专题的讨论不多,但在词义历时演变中有不少实例分析。赵克勤(1996)指出,“诛”“侵”“谤”等词其贬义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从低至高的演变过程。其他如刘福根(1997)尝试对詈词的恶意程度的强弱做量化分析,但其研究对象只是一个小类,以主观评分为分类标准不具代表性。另如王海霞(2005)也是在调查的结果上将褒贬词区分为五度。上述的分类都有些随意,真正开始讨论对褒贬义程度整体分类的是邹韶华(2004),他提出词义的褒贬色彩的七分法,将贬义分为偏贬(如“有脾气”)、轻贬(如“后果”)和重贬(如“恶果”)三类,由于针对具体词汇时操作较难,此问题仍待深入,这是纵向的程度分类。在横向的程度分类上,解海江、张志毅(2003)在对《现代汉语词典》义位褒贬陪义的标注分析时指出,《现代汉语词典》直接标注“贬义”的按其轻重分为三个层次,用“贬义”“一般/常含/多含贬义”“用于人时含贬义”加以分别,这种以使用范围分贬义轻重的方式是划分贬义程度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手段。

(二) 贬义的语义内容构成及其形成与演变

有关贬义的语义内容讨论主要集中在动物中的兽类、人的五官、排斥异己心理外化及其作用对象、民族审美文化差异等。常敬宇(1995: 30; 19)指出,汉语词汇中有不少贬义词是排异现象、男尊女卑等社会心理的体现。其他如伍铁平(1999: 373)提到文化差异与褒贬的形成问题,温端政(2006: 71)指出色彩有民族性,如“狗”的贬义。又如关英伟(1995)以动物为类别,分析讨论与动物相关的词语所蕴涵的不同褒贬义的显现。可惜的是,这些讨论多数着重于动物文化现象的描述,对相关的使用限定条件关注不多。



一般情况下,探讨词义的演化过程不免会涉及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词汇的感情色彩发生极性转变时。张博(2000)通过对汉语中具有“人为、技巧”义的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的意义衍化路线进行分析,将贬义的形成与具体的古典哲学思想相关联,提供了一种从语义聚合词群的相应衍化意义出发,以某种历史文化为背景,系统观察相关词义衍化的研究思路。

“左”“右”的词义褒贬也是与文化关系密切的论题,从民族文化阐释角度对其演化讨论得最为深入明晰的首推洪成玉和杨琳。洪成玉(1985: 139~143)在“色彩的转移”中分时期、场合详细讨论了中华民族尚左或尚右的习俗在语言中的表现,指出在官制上,战国尚右,两汉亦沿用,而后代则屡变。匈奴等少数民族官制尚左,而元朝蒙古族尚右;其他不同地区场合尚左或尚右各朝多有变动,且语言与社会政治趣味并不一致,唐时官制尚左,但词语中还是以右为尊,这种词语中的褒贬倾向与实际社会风尚褒贬评价不一的现象非常值得注意。杨琳(1996: 81~97)亦从“左尊右卑”和“左卑右尊”两个方面论述了这一问题在汉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态度、表现及其原因,也辅以少数民族材料为例证,并结合外语词汇中含“左”与“右”的褒贬词义成因作为比照对象来分析现代汉语中“左”“右”的特殊含义及其演变,其研究成果是目前对这一问题探讨得最详细、最全面的。张志毅、张庆云(2005: 264)则从对立立场互相拉动的角度讨论了这两个义位负面义的互动情况。至此,“左、右”的褒贬研究成为受历史文化影响而变化的语义研究中最详尽、切入角度最全面的一个小类。

有关感情色彩历时演变的研究非常多,大部分谈论词义演变的著述都会涉及。一般模式如周光庆(1989: 144),他将感情色彩的演变分为两种,一种是褒贬的互相转化,另一种是本来无褒贬的产生了褒贬倾向,此分类模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张志毅、张庆云(2001: 309)在词义演变贬降原则(具体分为贬化与降格)的讨论中指出,贬化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层次,词义的基义和陪义都有可能发生贬化。董为光(2004: 142~143)指出,同一词义在不同时代会因语义重点改变而发生意义及色彩代换,这种代换与因语义重点偏移或理解泛化而促使词义色彩产生的调整并不同。符淮青(2004: 145)认为:感情色彩变化的词,词的概念义往往也有变化。张志毅等学者的研究深化了词义贬化中语义细节的分析与描写。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旧有的基义与陪义这一分类法存在着较明显的缺陷。

贬义词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特点也是感情色彩演化关注的内容之

一。郭熙（2004：122~126）总结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语用的两大极端现象；刁晏斌（2007a, 2007b）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贬义词的过度使用与新时期的贬义词贬义色彩的变化情况与原因进行了考察，研究社会因素、人们的心理因素等对词语贬义色彩的影响。陈建民（1996；1999）、苏新春（2002：41）讨论了新词新义的色彩变化；汤志祥（2001：187）、郭伏良（2001：130~132）等都涉及从“文化大革命”到新时期词义色彩的转变问题，如汤志祥将新时期大陆、台湾、香港褒贬有变的词汇分为三类讨论：贬义中性化、褒义贬义化、中性词语贬义化，指出贬义词如“集团、幕后、洋务、一小撮、言论、策划”等回归中性，同时“倒”“陪”等中性词有贬义化现象，郭伏良也讨论了这种“S”形的路线；其他如刁晏斌（2006：193~194）指出，近年来“情趣”有指向情爱、色情趣味的倾向，“激情”亦是如此；张谊生（2009：62~67）讨论了新时期的贬义词贬义淡化现象，如“败”生出新的没有很明显贬义色彩的“败²”，并生成了语义相关的无贬义的“败家²”“败家子²”“败家子³”。要言之，这类褒贬颠倒或贬义淡化的现象往往是社会新思想对旧思想的叛逆与反动造成的，只是此种叛逆与反动会映射到什么样的词类范畴，又或是具体到一个什么样的词上很难预测。

词义褒贬的演变还与地域因素有关，目前这方面的考察侧重于社会性地域差异，学者主要讨论汉语词汇在大陆与香港、台湾及海外语境中所体现的差别。林杏光（1997：55~59）、苏金智（1995：109）、汤志祥（2001：254）、胡翔（2004：257~264）、郭熙（2004：349）、王洁（2009：129）等对此都有讨论，如汤志祥列举讨论了港式中文与普通话褒贬不一的词语；郭熙在讨论境内外汉语词汇的协调问题时提到新马华语中有不少感情色彩用语与大陆是不一致的，如“遣送”“一小撮”没有贬义；王洁则从“华语”视角对新词语在境内和境外其他区域存在的褒贬差异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又如外来词的研究与词汇贬义的关系。杨锡彭（2007：218；211）指出某些意译外来词的词义理据是建立在外语文化的基础上的，有特定的外语文化的特点，与汉语原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合，如“性感”一词，在汉语中因文化背景而有贬义色彩；梁晓虹（1994：145）、史有为（2004：184）也都讨论了外来文化概念在汉语词汇中的衍生和发展，如“魔”传入汉语后成为构词语素生成大量同族词，“劫”在梵语中原指梵天

的一个白天是一劫，劫后有劫火，而在传入汉语后引申出“大灾祸”的意思。无论是国别民族性的差异还是政体、历时因素造成的差异，当前关于这些社会性地域差异生成的词义褒贬不一主要讨论的是“异”，而生成差异的具体原因及是否能整合（至少在华语区内有必要）、整合协调的原则如何，目前仍罕有讨论。

除历时层面外，共时层面的感情色彩亦有变化，一般将其列为语用产生的词义变化。对语用中的贬义变化关注较多的是杨振兰（1995：93），她将词的表达色彩分为静态和动态分别加以探讨，指出词的色彩意义包括感情色彩，它会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会有不同程度的显现甚至产生相反的感情义。杨振兰（2004：136）还总结出了正用、反用、转用、虚用四种模式，并根据用后的贬义效果将虚用分为高用与低用。伍铁平（1999：384）提到模糊词的感情色彩在语用环境中会产生变化。关英伟（2000：41）指出，常有贬责意味的动物词在“属X的”格式中贬责意味淡化，常用来表戏谑。施春宏（2002）发现，“界”和“坛”这两个本来色彩大致相当的中性词语在使用中有一种潜在的微妙的色彩分化：“界”倾向于褒，而“坛”滑向贬。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他认为是因色彩也是一种功能，而色彩的差异正是语用分化的结果。其他如李金满（2008）谈到“娘儿们”在不同场合使用时表示的感情不一，用于指成年妇女有轻蔑义。目前，这类的讨论仍以点为主，除杨振兰（2004）的四种格式分析法外，其他的普遍性不强。

（三）语用习惯与贬义

谦词、詈词、禁忌、婉词、蔑称、贱称等都可能含有不同程度的负面意义，但在谈到有关感情色彩的褒贬及其变化时，人们对婉词的关注较多，而对詈词、谦词、蔑称等与褒贬义的关系重视不够。

陈松岑（2001）、洪成玉（2002：39～41）对尊称、蔑称和贱称等进行了讨论，谈到了汉语语汇中有不少因语用需要移用或特意造成的贬义词义。王宗炎（1998）对张志毅与张庆云提出的四种造词法进行了补充，其中提到的傲称、蔑称、隐晦称、滑稽称的造词法所造之词都含有一定程度的贬义。

许威汉（2003：132～149）则讨论了词义引申与褒贬，并从社会与语言两个方面分析影响词义褒贬的原因，区分修辞现象与词义自身造成的褒

贬,如婉词的用法。郭熙(2004:262)指出委婉语常用同义、近义、反义、比喻义、指代义等手法。按张志毅、张庆云(2001:48)的观点,1978~1994年,汉语至少涌现出200多个婉词。

詈词是贬义最鲜明、程度最高的词语的汇聚,刘福根(1997)、李炳泽(1997:149~156)、文孟君(1998:56)、王珏(2001:100)、曹炜(2004:208~214)等对詈词都有涉及,刘福根、李炳泽、曹炜等都指出詈词主要包括性、身体生理缺陷、身份品行品德低劣、智力低下、鬼神、什物等。曹炜(2004:208)有关于詈词基本状况的调查,对《现代汉语词典》中收集的157个詈词从性质、功用和结构上的特点进行讨论,郭熙(2004:263)指出,汉语詈词中“居于首位的当是‘性’的攻击”,它反映了汉语社会中男尊女卑、祖先崇拜和家庭本位等社会文化心理特征,其负面义最显著。若以与贬义研究的关联性为标准来看,上述詈词的研究要比谦词、婉词的研究更有参考价值,体系性与普遍性也较强。

(四) 相关应用与理论的讨论

与贬义相关的应用问题主要集中在词典释义上,目前对贬义的词典释义研究论述得最深入的是解海江、张志毅(2003),他们总结了《现代汉语词典》对义位褒贬陪义的注释方式和标注规律,主张释义时把“感情”与“态度、评价”区别开来,找出二者语义特征的不同,赞成《现代汉语词典》对义位褒贬陪义的分层次标注,强调基义与陪义中褒贬义的不同,讨论确定和辨析义位褒贬陪义的方法,并指出《现代汉语词典》在标注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于屏方(2007:140~141)及张志毅、张庆云(2007:321)等还谈到了词语固定搭配共现的贬义或消极韵律的释义问题。这实际上对贬义的分类与层次定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关贬义词的讨论还为词语研究的方法与思路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考,在关于确定词的感情色彩问题上,许威汉(2000:473)以“宰”为例,说明由于词自身义含有褒贬,故而研究褒贬义的演变须得透视词的历史变化进行揭示。许威汉的研究思路强调了历史变化的重要性,他指出这是林裕文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词汇·语法·修辞》一书中已经提出的看法,另外,他还认为分析词的感情色彩也须重视地域因素的影响。

汉语研究中对词汇的褒贬义的关注主要是受到了外语研究思路的影响,外语学界对词汇贬义的研究也为贬义词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思路与理